

从唐墓考古看厦门海岛早期农耕开发史^{*}

王新天 吴春明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 厦门唐墓及相关史迹的考古发现, 将隐藏在明清港市与海洋文明背后的早期农耕开发史翻了出来。这些史迹既是研究岛屿自然、人文地理变迁的重要座标, 也是重建以“南陈北薛”为核心的海岛早期农耕聚落形态空间格局的重要依据。虽经千余年的历史变迁, 中世纪农耕社会的聚落形态已被突破, 但迄今这一传统宗族社会的历史印记在社区文化上仍然十分鲜明。

[关键词] 厦门唐墓; 南陈北薛; 农耕社会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2X(2006)01-0052-07

厦门岛扼九龙江入海口, 处漳、泉之交, 明代晚期以来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东南之海洋门户。厦门港市海洋社会文化发展的中心是岛屿的西南角、厦鼓之间的鹭江两岸, 是清、近代以来闽南港市空间变迁的客观结果。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说, 鹭江海滨的古老码头、商铺, 鼓浪屿近代建筑的欧陆风情, 乃至笪笪水面的船家人文, 一直是历史、人文学者最引为关注的厦门海岛文化的核心内涵。

2005年春, 厦门岛屿中部禾山镇后坑村的唐代陈元通夫妇墓地的发掘, 却将湮灭数百年之久的厦门古代农耕社会文化史翻了出来。^① 陈元通夫妇墓地及相关的厦门海岛中北部若干唐宋墓葬遗迹, 揭示了唐宋以来大陆人文渡海来厦、移殖开发海岛的历史, 他们落籍相对平旷的岛屿中部, 垦殖农桑, 是中原内地典型的农耕文化的移植和延伸。从岛屿中部的农耕社会, 发展到西南海湾的海洋城市文明, 厦门海岛开发史的逻辑进程十分鲜明。本文拟以这些墓葬考古资料为据, 结合传世谱牒资料与村社人文聚落的调查, 重建这段厦门海岛的早期农耕社会史。

一、唐墓考古发现厦门早期农耕开发史

唐陈元通夫妇墓地位于今厦门岛屿中部湖

里区新建城区金尚路与仙岳路立交桥交汇处, 禾山乡后坑村低矮山丘的南麓,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前, 墓地周遭还是一片农田。墓地占地 500 平方米, 座北朝南, 经钻探、发掘证明地下埋藏的是两座东西并列的砖室墓。墓地保留两方清代陈氏裔孙刻立的大小相仿的墓碑。东侧墓碑弧首方碑, 高 1.33 米、宽 0.9 米, 镌刻楷书“唐上柱国陈公茔”, 落款“同治癸酉年重修”。西侧墓碑为平首方碑, 高 1.39 米、宽 0.9 米, 镌刻楷书“大唐赐进士出身陈公封茔”, 落款“派下裔孙廷芸允彩宗凯丹诏德圭为山等同勒石”。以往都根据这两方墓碑, 将其误为唐代赐进士出身、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的“陈僖”墓地。此外, 在两墓碑之间还摆放一方略小的墓碑, 高 1 米、宽 0.6 米, 镌刻楷书“唐唐令陈公茔”, 无落款, 该碑原本不是“陈僖”墓地的遗存, 据浦园社陈开熙老人介绍, 该碑是陈僖父亲陈丞墓的墓碑, 从“陈僖”墓地西面的小东山搬到这里的, 不属于该墓地的内涵。

经发掘, 两墓均为长方形砖室墓, 墓壁采用平砖错缝叠砌, 拱形券顶。东侧墓已被盗掘, 在墓顶部前部有一清代盗洞, 但墓室结构基本完整, 长约 5.6 米、宽 1.6 米, 该墓东西两壁上各有五个方形壁龛, 壁龛内不留随葬品, 北壁为一大壁龛, 龛内放置一个大型陶瓮、两个青瓷四系罐和

^{*} [收稿日期] 2005-07-10

一个双耳罐，墓室西壁靠近门处发现一面铜镜。墓室中部砖砌长方形棺床，棺床前、中、后部各设腰坑，棺木、尸骨朽烂无存，周围散落棺钉和数枚“开元通宝”铜钱，棺床前部倒覆一方石刻墓志铭。文有“故奉义郎前歙州婺源县令陈公墓并序”，“有唐大中九年，岁在乙亥，四月廿四，颍川陈公终于泉州清源郡嘉禾里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公讳元通，清源同安人也。”“陈元通祖父陈僖，曾祖父陈承（丞），父亲仲寓”。证实该墓墓主为唐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下葬的嘉禾里人陈元通，陈仲寓之子、陈僖之孙，生前曾为江西婺源县县令。西侧墓未被盗，墓室结构与陈元通墓基本相同，规模略小，长4.7米、宽1.36米，随葬品也较少，发现三个青瓷罐、一个青瓷碗、若干铜钱、残铁器等。墓内一方“唐故陈府君汪夫人墓志”，有“唐故歙州婺源县令陈府君夫人墓志铭并序”，可知墓主人是陈元通的妻子汪夫人。这次发掘表明，所谓“陈僖”墓地实际上是陈僖孙子陈元通夫妇的墓地。

厦门岛上经调查发现的类似唐墓还有“南陈”家族的陈夷则墓、陈侑墓、陈黯墓及“北薛”家族的“薛瑜墓”。史载陈夷则为颍川陈氏开漳祖陈邕之子，迁徙嘉禾屿的陈氏师祖，位于湖里区禾山镇江头村白果山的陈夷则墓座北朝南，保存椅子形石构墓围、龟形三合土冢堆，墓碑镌刻“唐紫金光禄大夫夷则陈公墓”，落款为“道光己亥年阳月各房裔孙等重修”。陈侑为陈邕之孙，位于禾山镇乌石浦村北的陈侑墓，座西北朝东南，墓上构筑同陈夷则墓，墓碑镌刻“唐著作郎陈公墓”，两侧落款为“嘉庆十四年重修”、“民国三十二年重修”。陈黯墓位于思明区西林村大东山自然村的观音山北侧，座西南朝东北，墓冢也同前二墓，墓碑镌刻“唐场老陈先生莹”，无落款。1997年发掘的所谓“薛瑜墓”，民间一直传说是唐代开发嘉禾屿的“薛令之墓”，清薛起凤《鹭江志·坟墓》语“侍御薛令之墓”即是，位于禾山镇县后村下忠自然村西侧山坡上，座北朝南，墓围、冢堆都采用三合土构筑，形态同前述“南陈”各墓，墓碑镌刻“唐侍御薛公之墓”，落款“乾隆乙丑年”，长方形砖室墓，墓壁以平砖错缝顺砌，墓壁共设12个壁龛，墓底前后2个腰坑，分别置放十二生肖俑、男女

侍俑及墓兽俑，出土鸳鸯莲荷双鱼纹银碗、双鱼纹银盏、方形铜镜、铜勺柄、铁器、双系瓷罐、四系瓷罐、箕形石砚及“开元通宝”铜钱等，与福建晚唐到五代墓葬的特点一致。发掘者根据随葬的银碗底部有后刻的“薛瑜”、“瑜”等字样，推定墓主并非中唐时期的“薛令之”，而是晚唐时期的“薛瑜”。^②

陈元通夫妇墓的形态和内涵与业已发现的内地、尤其是福建隋唐墓葬属于一个文化系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厦门大学郑德坤、林惠祥、庄为玠教授在泉州中山公园、安溪后垵等地发掘13座唐墓，建国以来福建省和厦大的考古人员又先后发现和发掘了近300座六朝隋唐时期的砖室墓葬。^③六朝时期的墓葬集中发现于闽江上游的建溪盆地、闽江下游的福州地区和闽南的晋江流域，隋唐墓葬则广泛发现于全省各地，形成由北往南、沿闽江干流和晋江干流扩展到其他地区的时空分布特点，与六朝以来北方汉民迁徙闽中、福建民族文化变迁的历史事实相吻合。正如有关史志所载，“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携家避难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留寓者居多。时京刺建州，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晋永嘉二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晋南渡时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故名晋江。”^④闽中地区早期郡县的设置始于闽越国除后所设的会稽郡属县“冶”，汉末建安八年扩为建安郡，领有闽江流域，西晋太康三年增设晋安郡，领有今泉州地区，唐时两郡再扩为建、福、泉、漳四州，正是中原内地汉族人群由北而南迁徙、闽中人口增长的结果。唐墓是厦门岛上考古发现最早的中世纪汉民墓葬，而且陈元通夫妇墓志铭上所记的世系与传世的《南陈世系》、《陈氏族谱序》、《颍川殿前陈氏族谱》等族谱描述的唐宋间闽南陈氏家族迁徙、活动基本一致。而以陈元通夫妇墓、薛瑜墓等为代表的唐代墓葬的考古发现，又与《闽书》等文献所记载的唐代“南陈北薛”披露褴褛、合力开发“嘉禾屿”的史事相吻合，再现了唐代陈氏、薛氏家族为代表的内地汉民开发厦门海岛早期农耕文化的历史。

厦门唐墓的一个显著文化特征是海岛封闭

型的农耕社会宗族文化在墓葬形态内涵上的体现。陈、薛两家族的墓葬都有清代以来形成的墓上结构,尤其是族裔树立的墓碑比较明确地保留了他们家族的唐代先人祭祀。如陈元通夫妇墓地有同治年间南陈派下裔孙设立的分别镌刻“唐上柱国陈公莹”、“大唐赐进士出身陈公封莹”的墓碑,虽然两墓所出的墓志铭显示墓主并不是唐代赐进士出身、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的陈僖,而是陈僖孙子陈元通夫妇的葬墓,但这并不影响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自唐至清乃至于今,这一带的陈僖派下裔孙对于先祖的历史是基本清晰的、宗庙祭祀是连续不断的。陈夷则、陈侑、陈黯各墓虽尚未发掘,但墓上碑铭同样显示了历经千年而大体明确、无误的陈氏裔孙的祖先认同。薛瑜墓也是如此,乾隆年间树立的墓碑镌刻“唐侍御薛公墓”,虽然该墓不是传说中唐代厦门开发史上的名人“薛令之”,但同样说明薛氏族裔对早至唐代先辈的祭祀也没有大错。厦门岛上的这些唐墓祭祀文化现象在我国已有的墓葬考古发现中十分突出。在我国元明以前的墓葬考古中,除了大型的皇陵、王墓之外,一般官绅、地主墓葬常因年代久远、宗族流失而罕有祭祀,因此绝大多数考古发现的汉唐时期中小型墓葬都是无主墓。即便闽南或福建其他地区发现有祖先祭祀明确的古代民墓,但罕见早到唐代的,而厦门岛的唐代墓葬却唯独例外。厦门岛唐代墓葬宗庙认同千百年不间断而如此清晰、牢固,透露出这个地方汉民宗族社会强势的人文特征,这一点应与海岛型农耕社会的封闭性、稳定性有关。由此可见,唐代南陈北薛聚族而居、相安于岛、相对封闭、向心发展,受到岛外内地中世纪以来变动的政经形势的影响和冲击很小,宗族祭祀和农耕社会文化格局自唐代形成,迄于晚近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成为千百年来厦门岛屿人文社会结构的基层特征。

二、自然、人文地理变迁与“南陈北薛”

厦门岛唐宋墓葬及相关史迹的分布,还是研究岛屿自然、人文地理变迁的重要座标,也是重建海岛早期农耕聚落形态的空间格局的重要依据。

地质学的调查表明,厦门海岛地质构造的基础是“闽东火山断拗带”东缘和“闽东南沿海变质带”西南部的交接处。不同地质时代的堆积的地貌单位在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形成了厦门岛内两高一低的地势特征,为古代人文提供了不同的活动舞台。洪济山脉(西姑岭—云顶岩)、仙岳山是两列东北—西南向的高丘陵地势,海拔200—500米之间,是岛屿地势的最高一级,其中云顶岩一带为花岗岩体,仙岳山一带的火山岩夹火山沉积构造为上侏罗纪的南园组地层,流水侵蚀严重,古今人文活动稀有。两列高丘陵的边缘为海拔50—200米的低丘陵,为岛屿地势的第三级,多是花岗岩、火山岩构成,少量土层深厚的低丘,历史上已辟为旱作梯田。在丘陵高地的外围,岛屿中北部、东部则出露有晚更新世龙海组的砖红土、棕红土等地层堆积,经长期的海浪等外力侵蚀磨蚀和风化形成红土台地,海拔5—50米,阶地地面平坦,构成岛屿第二级阶地,是岛上最开阔的平坦地,也是中世纪以来农耕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地带。此外,岛屿南面的厦大校园、西面的筓筓湾、北面的钟宅湾等地的低洼平原和海滩地貌,海拔0—5米,出露有全新世长乐组海积、冲—洪积、湖积的灰色和黑色堆积,是岛屿上最低一级阶地。^⑤由于陆源物质的不断冲积、堆积以及人类的开发活动,这些低洼平原一直在不断扩展中,乾隆年间筓筓港的内湾在今莲坂、江头一带,南岸在今溪岸、浮屿之间,约在今厦禾路一线,同时期厦大附近也有深入到演武亭、顶沃仔的港湾,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以后才有大的改变,逐步形成今日的格局。^⑥

从中北部的唐宋农耕社会,到西南海湾的城市与港口建设,厦门岛人文地理的变迁也有清晰的轨迹。早在先秦时期,厦门海岛的南部边缘海岸地带就有人类活动,1931、1932年,林惠祥教授就先后在厦岛南面的蜂巢山、南普陀山采集到有段石镞、印纹陶等遗物,应是汉人迁徙海岛前百越土著先民的文化遗存,但是这类遗存数量不多。^⑦唐宋以来,内地汉民人文的移殖和岛屿中北部的全面开发,农耕社会的人文地理大局形成。朱熹《金榜山记》载:“金榜山在嘉禾廿三都北,有岭曰薛岭。岭之南,唐文士

陈黯公居焉。岭之北，薛令之孙徙居于此，时号南陈北薛。”^⑧何乔远《闽书》载：“嘉禾屿，屿在海中，去县七十里，在其南。以曾产嘉禾名。又名厦门，又名鹭屿。今中左所在其中，防扼海门，险地也。屿广袤五十余里。……西北有岭曰薛岭。岭南，唐陈黯居焉。岭北，唐薛令之自福安徙家于此。时号‘南陈北薛’。”^⑨清周凯《厦门志》卷二“分域略·山川”也说：“薛岭，在洪济山西北。薛沙卜居于此，人称所居岭为薛岭；岭之南，唐陈黯宅在焉。时号为南陈、北薛。”薛岭位于厦门岛中部、钟宅湾与筓筓湾之间的一列低矮山丘，薛岭以北至高崎、以南至云顶岩间的开阔地带，所谓“广袤五十余里”就是指这片岛内最平坦的第二阶地，成为唐代“南陈北薛”家族移殖的落脚点，也是岛屿农耕经济文化的处女地。周凯《厦门志》卷二“分域略·沿革”语：“宋名嘉禾里，以产嘉禾得名。”同卷引《鹭江志》更明确说“宋太平兴国时，产嘉禾，一茎数穗。故名。”这些记载说明，唐宋时代厦门岛中、北部农耕经济的发展在闽中地区占据重要的地位。

明代以来随着中左所所城的建设与西南港湾的兴起，厦门海岛的人文地理出现了重大变迁。清薛起凤《鹭江志》卷一“总论”语：“鹭岛者，……唐宋以来，并为村墟。明洪武时建所城，领以千户，而市镇之设自此始矣。”周凯《厦门志》卷二“分域略·沿革”载：“宋为嘉禾屿，属泉州府同安县。……元因之，立为千户所。明为中左所。”卷二“分域略·城寨”说：“厦门城在嘉禾屿。洪武二十七年，江夏侯周德兴造。周四百二十五丈……”。清代以来，由于“厦门处泉漳之交，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十闽之保障，海疆之要区”，港市兴起，“商贾辐辏，帆樯云集”，“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藪，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⑩据清《鹭江志》、《厦门志》的“鹭岛（厦门）全图”，明清厦门城发展于岛屿西南，密集的商铺兴起于鹭江海滨，直到上个世纪后期，厦门市政的中心仍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明清厦门的城圈遗址已经

为考古调查所揭示，城址位于厦门岛的西南部，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南北长约 436 米，东西宽约 484 米，实际周长约 1450 米，面积近 15 万平方米，迄今仍在新华路北侧山丘上出露一段长约 80 米的石砌墙体，四个城门中仅北门保留有门址。^⑪

厦门岛唐宋墓葬及相关史迹的分布规律是岛屿开发史逻辑进程的时空座标。从唐墓的空间分布来看，已经发现和发掘的“南陈”陈元通夫妇墓、陈夷则墓、陈侑墓、陈黯墓和“北薛”薛瑜墓无一例外地位于洪济山脉之云顶岩以北的平原、缓丘地带。在云顶岩以西、以南的岛屿西南部以及筓筓港湾两岸，除了金榜山北侧山腰传说中的“陈黯隐居石室”外，^⑫几乎不见唐宋人文史迹，更无唐代人群活动的聚落和墓葬遗址。厦门岛唐宋史迹的宏观聚落形态特征，准确地勾画出了内地汉人迁徙厦门岛早期的人文活动范围，与前述史籍所记载的岛屿中北部的空间位置完全相符。他们将内地农耕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移植在这里，并构筑了一个聚族而居、相对稳定的农耕社会。在岛屿西南部的厦门港市兴起之前，中北部的农耕社会一直是厦门海岛社会经济文化的主流。

厦门早期农耕社会的核心结构是“南陈北薛”，但文献记载和谱牒资料对“南陈北薛”具体指谁，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涉及年代与辈分最早的是明永乐年间的陈隆《〈陈氏总族谱〉序》等资料上所主张的“陈夷则、薛令之”说。据《〈陈氏总族谱〉序》陈夷则的父亲陈邕是颍川陈氏开漳始祖，“则与锡兄弟于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举家三百口迁入嘉禾岛。时宫室未就，权居草舍，今人遂号曰‘陈寮’是也。间有洗马坑。乃用钱一百万贯闻官请产。披荆榛，共建第宅，立庙创寺宇，名曰‘觉性院’。则居浦源，锡居坂上，后海宁薛令芝来同里间，乡人有‘南陈北薛’之称。”《颍川殿前陈氏族谱》等也都有类似的记录。^⑬不少研究者质疑，被指为“北薛”的薛令之（683—757 年）为唐长溪（今福安）人，福安地方志和当地薛氏族谱记载薛令之墓“坐落于二十一都泉埔山”，至今仍有南宋嘉定十三年“有唐补阙薛公之墓”的神道碑，因此薛令之死后就葬在福安，生前并未迁

居厦门。更何况陈氏族谱记载的陈夷则迁徙嘉禾岛之年,薛令之已去世 25 年,两人不可能“同里巷”。^④

将陈夷则的孙子陈僖视为开发厦门之“南陈”始祖,是依据考古出土墓葬碑铭资料提出的。1970 年代,泉州东郊石井村发现的《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记载了晚唐陈僖迁徙、开发嘉禾岛的历史。^⑤许氏陈夫人为陈僖之曾孙女,其“祖仲禹,幼资经术,弱冠游于京师,既而授广州番禺县丞。伯元通,任歙州婺源令。父元达,任虔州虔化县丞”,所记陈氏世系与族谱资料、新近发现的陈元通夫妇墓地所出墓志铭记载完全吻合,应是可信的。《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还记录了陈僖开发嘉禾岛之事,“曾祖僖,爱仁好义,博施虚襟,俊义归之,鳞萃辐辏,故门有敢死之士,遂为闽之豪族。时闽侯有问鼎之意,欲引为谋,乃剝舟刻楫,罄家浮海,宵遁于清源之南界,海之中洲,曰新城,即今嘉禾里是也,屹然云岫,四向沧波,非利涉之舟,人所罕到。于是度地形势,察物优宜,曰可以永世避时,贻厥孙谋。发川为田,垦原为园,郡给券焉,家丰业厚,又为清源之最。”据此,陈僖才是罄家浮海开发嘉禾岛的“南陈”第一人。

但是,文献记载的“南陈”始祖中,“陈黯”说影响最大,朱熹、何乔远、周凯等历代大家都这么认为。陈黯(—870 年),字希儒,号场老,是晚唐厦门名士,号称厦门历史上第一个文人,著有《碑正书》三卷、《颍川先生集》五卷,^⑥因科举失败退隐,今金榜山北侧还有传说的“陈黯隐居石室”。前引朱熹《金榜山记》载:“金榜山在嘉禾廿三都北,有岭曰薛岭。岭之南,唐文士陈黯公居焉。岭之北,薛令之孙徙居于此,时号南陈北薛。”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说:“薛岭。岭南,唐陈黯居焉;岭北,唐薛令之自福安徙家于此。时号‘南陈北薛’”。周凯《厦门志·山川》也说:“薛岭,在洪济山西北。薛沙卜居于此,人称所居岭为薛岭;岭之南,唐陈黯宅在焉。时号为南陈、北薛”。不过,陈黯是否厦门岛早期开发史上的“南陈”家族嫡裔,明清谱牒与唐宋文献的记载互有冲突。比如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嘉禾南陈宗谱都将陈黯编入嘉禾南陈直系成员,说是陈元通次子,而陈黯内侄黄滔所作

《〈颖川先生集〉序》却说“先生讳黯,字希儒。父讳贽,通经及第,娶江夏黄夫人,贤而生先生。无昆仲姊妹。”^⑦黄滔为陈黯时代的至亲,所述较为可信,而且还有不少史志谈到陈黯是莆田人,如《漳州府志》亦载有“郝连韬‘与莆田陈黯布衣祭酒有声’”。^⑧因此,陈黯很可能就不是嘉禾南陈的嫡裔,更不是陈元通之子,他是在科举失意后从莆田来海岛隐居的。嘉禾南陈陈氏族谱将此一陈黯视为直系,或是受到朱熹、何乔远等名家写作的影响,也因陈黯是唐代厦门名士而有攀附之嫌。

不过,史志文献、谱牒在“南陈北薛”具体所指上的“出入”,实际上还与历代人文、史家理解、观察社会文化现象的立场差距有关。就厦门海岛早期开发史的立场而言,在“南陈”方面,《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所记载的陈僖宵遁嘉禾、发川为田因是“当代史”,比较可信,至少“南陈”入厦不应晚于陈僖而迟至陈黯时代,但也不完全排除后世谱牒所记载的陈僖祖辈陈夷则就已经举家迁徙、开发嘉禾岛的可能性,也许将来更多唐墓碑铭的发掘、出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北薛”方面,何乔远《闽书》、《〈陈氏总族谱〉序》等提到薛令之,朱熹《金榜山记》提到薛令之孙,可见不脱与薛令之的干系,何况何乔远也说“自福安徙家于此”事,因此不能因为福安留有薛令之的史迹、乃至于墓地而否认薛令之作为开发嘉禾的“北薛”先人的地位。而且,“南陈”始祖与“北薛”先人未必一定要绝对“共时”才可以并提,从这点上说《〈陈氏总族谱〉序》等所说的“同里间”、朱熹《金榜山记》冒出的“薛令之孙”都是对真实历史的画蛇添足。不过,文献、史志上所记的“南陈北薛”不完全都是站在从厦门岛开发史的立场上的,朱熹《金榜山记》、何乔远《闽书》、薛起凤《鹭江志》、周凯《厦门志》等中的“南陈北薛”,实际上都是对唐代嘉禾岛两大宗族分聚格局的重视与记述,是对厦门海岛早期农耕社会的宗族聚落形态特征的描写,在此情景下各取其名士陈黯、薛令之以为象征,作者恐怕也没有求其为开山之意。即便陈黯可能并不是开厦的南陈始祖陈夷则或陈僖的嫡裔,也丝毫不影响原作的用意。就这点来说,后人更不必纠缠于陈黯、薛令之是

否“南陈”、“北薛”始祖及是否同时的细节了。

抛开史籍和谱牒在“南陈北薛”具体所指的出入,我们更重视的是两个清楚的历史事实。第一,唐代内地汉民迁徙,开发嘉禾屿的重心在岛屿中北部,即“薛岭南北”地带,几乎所有的史籍、谱牒都有一致的描述,也为岛内唐宋墓葬考古及相关人文史迹的空间分布所印证。第二,“南陈北薛”是嘉禾屿早期农耕社会文化的核心架构,南陈、北薛两个家族于薛岭南北聚族而居,真实地反映了厦门传统文化中农耕社会聚落形态体系的宏观特点。有趣的是,现已考古发现的陈夷则、陈侑、陈元通、陈黯等陈氏墓地也都在薛岭山以南,薛氏墓地却都在薛岭山以北,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南陈北薛”宗族社会关系史完全是一致的。

三、历史的印记

从近年我们对厦门岛内传统农耕社区的调查表明,迄今岛内仍然保存了十多个陈、薛两氏的宗族村社,虽然两个家族的成员有不少外迁的,但两姓的宗族聚落仍然都局促于唐宋时代奠基的传统地盘,其中“南陈”家族获得了广泛的扩张,有分布于岛屿中北部的浦园、殿前、后浦、马垵、塘边、小东山、县后、坂上、围里、墩上、岭下、薛岭等村,而“北薛”家族相对萎缩,目前主要居住在安兜和林后两社。百年前英国人笔下的这一区域,仍是一片浓郁的田野生活:“岛的北部和东部是平原,耕种非常好。人口稠密,主要产物为地瓜、米、麦、花生和蔬菜。”^⑩

“南陈”最原始的聚落应该是浦园,原称浦源,现有人口二百多人,原来是陈氏单姓村落,最近二十年来逐步有外来异姓迁入。传说这里就是开厦始祖陈夷则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迁徙、落脚嘉禾屿的地方,称之为“秧地”。厦门岛其他陈氏聚落大多由此分基出去,浦园社的“嘉禾陈氏大宗祠”似乎见证着这段历史。

“南陈”最大的聚落是殿前,人口四、五千人,位于厦岛西北部,传由南陈十四世祖陈宝从浦园分基过来的,到二十六世祖真泰、阳泰公时兴旺起来。“殿前地房有祠堂,由来久矣。清初郑成功踞厦岛以抗清师,全禾几断人烟,而吾祠遭毁,祇余平地。光绪辛巳年间,裔孙祖吉输

款,起而兴建,……”地房祠堂真实地经历了近世殿前陈氏社会复兴的历程。^⑪殿前继周堂陈永宽先生说,以前陈氏家族主要以农业为生,种植水稻、高粱、地瓜等杂粮和蔬菜,有些人还从事滩涂养殖,但绝少出海捕捞。此外,马垵、后浦、塘边、小东山等地的陈姓都是由殿前分基出去的,人口规模都不是很大。

县后、坂上、围里、墩上、岭下这五村俗称“五户陈”,自称为陈夷锡的后人。“五户陈”有公共祠堂——嘉禾县后崇本堂,乾隆三十六年的《嘉禾县后陈氏宗庙碑记》记载了五户陈的始祖迁徙入嘉禾事:“公讳义,一名恕,太傅邕公次子讳夷锡之后,由漳来同,徙入嘉禾,聚族坂上。……后人立庙,将我始祖祀在同邑立公堂之后,至明末生齿日繁,难以人人渡水祭献,因就近建庙,与县庙同日而并祀之,乡亦曰县后者,明厥自也。”“五户陈”位于厦门岛的最北端,远离近现代城区,稻作农耕、蔬菜种植业一直是经济生活的主体,宗族的族产也主要是农田和谷物。同碑记云:“祭业丘段、种谷、坐落、四至开列于左:一、族遗祭业大小园地十三丘,共种一石二斗,坐落薛岭刺山脚大路西,……文燠公充入祭田一段,大小三十五丘,公种五石五斗五升,坐落湖莲、何厝、前洋,……一、公置觉性院大祖墓前后祭园,大小十丘,共种一石零三升。……一、公置觉性院祖墓前、大路下祭田大小七丘,共种七斗,……”^⑫南陈对祖宗祭祀十分重视,每年有春秋两祭,春祭在每年的正月十五左右,秋祭则安排在冬至前后,四月初十还集体扫墓。“祭田”就是古代农耕社会维持宗族祭祀等公共活动而建立的公产,近年才在工业化冲击下发展成为靠出租祠堂为台球室、老人活动室甚至临时商铺以维系。

“北薛”的后人如今仅见于岛屿中北部的林后和安兜两社,但其人口规模却也不小,两社的薛姓约有两、三千人。两社本来是薛姓单姓村,由于上世纪四十年代高崎机场建设用地安置的外姓人迁入成了杂姓村。安兜与林后两村毗邻,在工业化之前薛姓居民也主要从事水稻、地瓜、小麦、花生和蔬菜等的种植。在林后薛氏祠堂保存一方“兴修薛家宗祠碑记”,有关嘉禾薛氏的渊源说:“唐神龙二年进士、侍御令之公

徙居禾屿,为肇基祖;宋绍熙元年、四年舜俞、舜庸公昆仲相继登第,文学宦绩,后先辉映……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季卿公自长泰县山重村衍派厦门,亦历五百四十八年春秋矣。”这说明自唐代开基以来,闽南的其他地区的薛姓宗族还不断迁徙、补充厦门的“北薛”社会,形成新的整合和认同。

“衣冠陈氏族,桃李薛公园”,^②经过千余年的历史变迁,尤其是明清间的禁海迁界、清代的港市兴起和海岛社会经济空间格局的转换,乃至近百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南陈北薛”为核心的中世纪农耕社会聚落形态体系已被突破。但是,从这十多个基本保留传统社会形态的宗族聚落看,中世纪农耕社会历史的印记仍然十分鲜明。

注释与参考文献:

- ①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发掘成果:龚小莞:《八大唐墓之一陈喜墓开挖》,《厦门晚报》2004年12月31日;《“陈喜衣冠冢”确定为陈元通夫人墓》,《厦门晚报》2005年1月7日。
- ②厦门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厦门市文化局:《厦门文物志》,第65—67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 ③ Cheng Te-kuang, The Excavation of Tang Dynasty Tombs ta Chiuan—chou Southern Fukie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4, Issue 1 (May 1939), 1—11. 庄为玠:《1939年安溪唐墓考古记》载《福建隋唐古墓考古记(第一编)》,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63年翻印本,收入庄为玠著《海上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林忠干、林存琪、陈子文:《福建六朝隋唐墓葬的分期问题》,《考古》1990年2期。
- ④ [民]《建瓯县志·礼俗》, [乾隆]《福州府志·外纪》, [乾隆]《泉州府志·山川》。
- ⑤ 厦门市地理学会:《厦门经济特区地理》第6—2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
- ⑥ [清]薛起凤主纂:《鹭江志》卷一“鹭岛全图”,鹭江出版社1998年;卢昌义主编:《从筓笪港到筓笪湖》

- 附录“1990年前厦门市全图”、“1908年厦门城市全图”、“1931年厦门市规划图”,“1963年厦门岛地图”,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 ⑦ 林惠祥:《福建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第八册(1954年)。
 - ⑧ 引自《朱子遗集》卷五“记”,载《朱子全书》第26册“朱子佚文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 ⑨ [明]何乔远编撰:《闽书》卷十二“方域志”之“泉州府·同安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 ⑩ [清]周凯:《厦门志》“自序”、卷十五“风俗记·俗尚”。
 - ⑪ 厦门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厦门市文化局:《厦门城遗址》,《厦门文物志》,第57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靳维柏、郑东:《厦门城址调查与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6期。
 - ⑫ 厦门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厦门市文化局:《厦门文物志》第61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 ⑬ 厦门湖里区殿前陈氏宗族提供资料。
 - ⑭ 张宗洽:《“南陈北薛”究竟是指何人》,《厦门晚报》2005年1月5日“乡土”专栏。
 - ⑮ 何丙仲编纂:《厦门碑志汇编》,第37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
 - ⑯ [清]周凯:《厦门志》卷九“艺文略·书目”。
 - ⑰ [清]薛起凤:《鹭江志》卷四“艺文·序”,鹭江出版社1998年。
 - ⑱ [清]周凯:《厦门志》,卷十三“列传·文学”引《漳州府志》语。
 - ⑲ 包罗(C. A. V. Bowra)著,余丰译:《厦门》,《厦门文史资料》第二辑,内部发行,1983年。
 - ⑳ 《(民国十六年)殿前地房祠堂记》载何丙仲编纂《厦门碑志汇编》第41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
 - ㉑ 何丙仲编纂:《厦门碑志汇编》第396—39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
 - ㉒ [宋]张翥:《嘉禾风物吟》,引自周凯《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